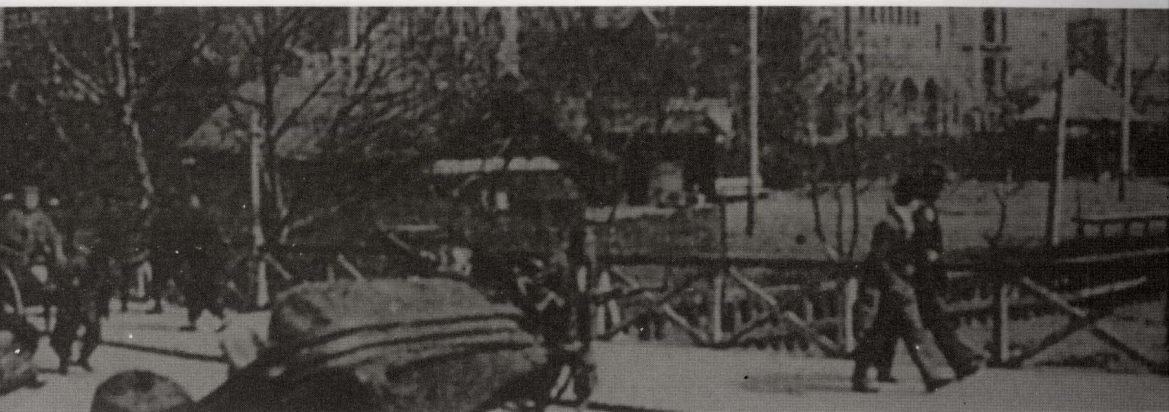


另眼相看

..... 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



Lingyan Xiangkan

王维江 吕澍 辑译

Wangqing Deyu Wenxian Zhong De Shanghai

上海辞书出版社

100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0; 284: 2689-2695.

另眼相看

..... 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

Lingyan Xiangkan

Wangqing Deyu Wenxian Zhong De Shanghai

王维江 吕澍 辑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王维江,吕澍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8

(外国文献中的上海)

ISBN 978 - 7 - 5326 - 2869 - 8

I. 另... II. ①王... ②吕... III. 上海市—地方史—史料—清后期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7938 号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汪 溪

外国文献中的上海

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255 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869 - 8/K · 628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序

周振鹤

1

上海在十九世纪初以前,在西方世界还是默默无闻的。虽然上海的贸易地位很重要,但主要是内贸发达,外贸不十分重要。清嘉庆《上海县志》里所说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乃因内贸繁荣而形成上海城市发达的写照,与外贸关系不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西洋商人不愿意只受中国一口通商的限制,四出寻找新的通商港口。当他们深入到上海港后,发现这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于是筹划如何进行利用。当然在发现上海之前,宁波附近的舟山以及厦门等地都曾存在过小规模的外贸活动。清朝前期更有过四关并立的情况,但在四关中,一直以广州港的外贸最为重要,而且到乾隆中叶,外贸港口最终还是收缩于广州一地,真正实行了闭关政策。

由于广州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处于何时都呈现开放状态,所以十六世纪以来描述广州的西方语言著述一直不断,有些著作虽然标题有时大到有关中国的整体,但其实所描写的仅仅只是广州一地,甚至还不是广州全部,而只是西洋人能够涉足的广州部分地区而已,这一点只要看前两年翻译出版的瑞典人彼得·奥斯特贝克所写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航海记》便可明白。至于上海,在1830年之前,不但未闻有专门的西文著作予以介绍,甚至专文描述也似乎未曾见到。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胡夏米与郭士立等人数次北上,进入上海,才发现并预言此处将是未来中国最为重要的港口。郭士立的《中国沿岸三次航行记》就有对上

海的较详细的描绘,这或许是西方人关于上海的早期著述。这以后有关上海的著述或以篇章出现,至于以专著行世,一直绵绵不断。这些西文著作以英文最为大宗,为其他语言所远远不及,但究其实,其他西方语言中涉及上海的篇章并不在少数。法文不论,这大概因为法国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所致,但翻译成中文的也并不多。而将德文著述中有关上海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的则前未之见,有之,则自王维江、吕澍伉俪此书始。

中国学术界的德文水平不算强,除了哲学与医学著作外,德文著作与文章译成中文者实在不多,当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稍多,但比起英法两语种仍然是少焉之者,因此这本德文著述里的上海以及将来还要问世的德文著述里的北京等译作,将对不通德语者如我,是极感兴趣而且极有用的历史文献。在上海开埠以后,不是没有德国商人前来,尽管为数不多,但当时德意志尚未统一,邦国林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外交使团到中国来分食列强侵略中国的成果,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鲁士王国艾林波使团才来到中国,打算与英法美列强分一杯羹。他们来到上海,一切觉得奇妙,观感特别深刻,所以艾林波与使团诸人所写下的关于上海的印象尤其鲜活。由1845年英租界设立到六十年代中的二十年间,这一段上海历史资料明显不足。此时上海正在开始城市的近代化建设,但《行名录》之类的重要编年资料尚未出现,所以观光记录于弥补史料的缺环,尤为有用。如使团成员之一的柯艾雅写道:“1861年的上海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欧洲城和中国城。前者完全是优雅的欧洲大城市郊外新城的景象。宽阔的大路边,是花园环绕的高大的宫殿式建筑。大路笔直地延伸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耸立着,还有不少的大广场……事实上,码头就是上海的主要街道,我们选择它作为散步的地方,林荫蔽日,视野开阔,各色人等都有。”

读者也许以为这样的描写过于夸大,其实并不然,这基本上是当时上海的真实写照。要知道当时的欧洲城市建设有许多比上海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有的甚至还不如。巴黎近代城市的形成是由1853年的大改造开始的,在此之前,巴黎街道狭窄弯曲,一下雨就积水,完全一副中世纪城市的面貌。而由1849年的

上海英租界图看来,上文所谓的“欧洲城”其实已见端倪。因此集中于本书中的从清代晚期直到民国初年的德语文献关于上海的记述,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甚至片言只语都有其价值。如德国著名地理家李希霍芬(他的大作《中国》至今在中国没有全译本,而日本却早已译出)也是1861年来到上海的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成员,他在1868年又重来上海一次,两次比较写下了一段短短的话,也被王维江他们从《中国日记》里找了出来,这样做有点辛苦,但却让读者受惠了。

他者的眼光对于本土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认知,无须在此赘言,但问题是翻译工作始终是个瓶颈,既不算科研工作量,稿费也不高,出版社也不见得愿意出,更缺乏科研基金的资助。据王维江最近的初步调查,有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的德语文献,至少有二百多种,这是一笔重要的近代史研究资料,因此很希望能有多一些的译者来从事这项工作,也希望有关的科研机构能予以大力支持。王、吕二位的工作就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支持下进行的,我想肯定也会有其他研究单位有这样的眼光与举措。就以这个良好的愿望作为这一小序的结尾吧。

前言

据 2007 年 11 月 15 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德累斯顿银行于当年的 11 月 13 日发布了一年一度的旅游业研究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国人又一次成为世界旅游的冠军(Reiseweltmeister)。此项评选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该国人民为旅游所花费的钞票的多少。在 2006 年，德国人在旅行上的消费共计 580 亿欧元。^①

德国人确实是一个热爱旅游的民族。今天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旅游是一种产业。旅游，尤其是出境游，是度假、休闲和享受的同义词，而过去不是。远的不说，即使是 18 和 19 世纪的德意志人，如同其他欧洲人一样，他们不知旅游业为何物，更不会把旅游跟休闲联系在一起。那时，外出旅行即意味着冒险，意味着遭遇强盗，甚至意味着丢掉性命。

于是，出家远行便成了贵族和有钱人的差使和义务，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终其一生也不会出一次远门，这倒是与中国人的祖训相谐——我们的老祖宗信奉“父母在，君子不远游”。但德意志的贵族是所谓的蓝血贵族，代代传袭，把吃苦耐劳看作是高贵品质的组成部分，由此养成这一品质也成为贵族子弟教育的一部分。他们——也包括英国人和法国人——把即将成人的孩子送上旅途，通常是送往意大利，让孩子们去接受古典和近代文化艺术的熏陶，作为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

^① 2007 年 11 月 15 日《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头条(www.faz.net)。

那时的交通工具还是马车,道路不平,交通事故频发,语言也不通,一个星期能走 400 ~ 500 公里算是快的。尽管如此,贵族和富室子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种传统的“教育旅行”(Bildungsreise)。当然,成人们也进行类似的旅行,但这已不在“教育旅行”的范畴之内,而是有品位、有目的的艺术和文化之旅,当代旅游业通常将之称为深度旅游。1786 年,歌德(1749—1832)的《意大利之旅》及其《日记》,至今还是德国人心目中的经典旅行模式。^①

千山万水相隔,如果不是身负特殊使命,德意志人轻易不会来到中国,而所谓的特殊使命,不外乎传教和外交。中国人所熟悉的耶稣会士、被康熙皇帝封为“通玄教师”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就是为传播福音而梯航万里来到中国的。这样的人物,今天德国的知识人依然钦佩,2000 年,德国作家 Uli Franz 出版了小说体的汤若望传记《在上苍的阴影下》,^②一时也有不俗的反响。笔者当时正好在汤老先生的故乡——科隆,由此而发思古之幽,立即去探寻其故居。大感意外地发现,他的出生地就坐落在今日科隆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新集市(Neuer Markt),如今这里已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昔日风貌荡然无存。询问店员,他们已不知道汤老先生是何方圣贤。

为上帝献身的人是圣徒。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为了给我们送来《圣经》和十字架。其千秋功过,华语世界里已有太多的正负面评价,此处不赘。而为了外交使命来中国的德意志人,则迟至十九世纪的中叶,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德意志人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7)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国人打探消息、献计献策,并在 1842 年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但他的行为并不代表政府的意旨。别忘了,他是新教传教士,而新教与天

① 歌德:《意大利之旅》(Italienische Reise), 1829 年初版,一个多世纪以来,该书多次再版。很多德国人背得出其中的经典段落,电影、电视剧也常以歌德的《意大利之旅》作为开掘题材的灵感源泉。

② Uli Franz, *Im Schatten des Himmels* (《在上苍的阴影下》), DTV, 2000.

主教传教士在品格和学识上的区别,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人已有判断。^①更何况,郭实腊的老婆是英国人,“妻管严”也并非当代人的专利。

准确地说,官方的德意志人与大清政府正式打交道是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比英、法晚来近二十年。那时还没有德意志帝国,所谓“德意志者,日尔曼列国总部名也,旧名邪马尼,居欧洲中部,同盟三十六国,而中惟布路斯最强”。^②也就是说,那时的德意志,实际上处在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中最强者为“布路斯”,即普鲁士;所谓“邪马尼”,应该是德语“Germania”的音译,即我们今天通称的“日耳曼”。那时的中国人不甚明了这一国家,以致对普鲁士国名的翻译竟有二十余种。^③这就难怪,在“鬼子”已经“进村”的关头,上至总理衙门的首脑奕訢,下至在上海的通商事务大臣兼江苏巡抚薛焕,根本不知道“Po-Lo-Su”(普鲁士)是什么国家,薛焕竟将其误断为“Pi-Li-Si”(比利时)。

然而,德意志人这一次可是有备而来,他们做好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充分准备。这个由普鲁士政府派出的东亚外交特使团于1861年3月抵达上海。该使团由邦国中的老大普鲁士和关税同盟共同派遣,故代表着所有邦国的利益,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尽快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而且每个邦国都想得到一

① 1888年来华的德意志银行的恩司诺(Exner)先生非常有趣地比较了新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的区别:“我要说的是,传教人员选择传教这一职业的原因不同。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选择这个职业,是出于信仰、爱和行善,在传教之前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耶稣会规定要整整十年——然后才被允许去异教徒中间宣教。而新教,首先是在美国的布道团里,却有不少冒险家,他们把这个职业等同于一门手艺,用来养家糊口。美国的传教士——偶尔也有些英国传教士,是些所谓的改邪归正的小偷、破产的手艺人和各种伪善的冒险家。再加上他们都是结了婚的——这也与他们的天主教兄弟们不同,‘美国传教士家庭’这个词,很快就成了‘很强的繁殖力’的同义词。”参见本书相关篇章。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邦交五》,第16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99页。

③ 如“单鹰国”、“不鲁西亚”、“破鲁斯”,等等。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44,第1页;卷57,第1页。光绪二年重刊本。Bernd Eberstein, *Preussen und China* (《普鲁士与中国》), p. 129.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07.

份条约,一体均沾英法《天津条约》所攫取的利益。此时的清政府,既不知布路斯在何方,更不知他们来华的意图。“我大清”只好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祭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羁縻“蛮夷”的法宝,让地方官与“鬼子”玩太极推手——只要把“鬼子”留在上海、不来京师即成。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处在危机第一线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对付“鬼子”的招数“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一直受到当时人和现在一些史学家的嗤笑。其实,应该受到嗤笑是大清政府,而不是具体办事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是羁縻策略的实际执行者而已。人说“弱国无外交”,一个根本不知近代外交为何物的大清“弱国”的第一线官员,除了“六不”招数,还能有什么作为?!

幸好这次来的德意志人并不想动武。带领这支庞大的外交特使团的领导艾林波伯爵(Graf Friedrich zu Eulenburg, 1815—1881),早在启程之前,已经悟得破除羁縻术的秘诀:“挥师”北上(天津或北京)谈判,因为他知道大清钦差玩的仍然是“一鸦”和“二鸦”期间谈判的把戏:今天推翻昨天的承诺,明天寻找新的借口再谈,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把“鬼子”的耐心消磨殆尽。看来,中兴的同治朝并没有吸取祖先赔款割地的教训。光绪中叶的李鸿章心知肚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却也无能为力,只有在私人信函里发发牢骚而已——“歃血未寒,盟书又弃,其何以示大信于天下?”^①“鬼子”一进村,政府就慌了神,立即答应了对方的签约要求。

完成使命后,外交特使团于1862年4月返国,前后历时将近两年,其四大卷的考察报告于1873年正式出版。^②不仅如此,使团的很多成员都自发撰写了日记、书信、通讯报道和回忆录,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统称其为游记。其作者,

① 《复张幼樵待讲》,《李鸿章全集》,第6册,《朋僚函稿》,卷19,第377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Anton Berg, *Die Preuß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以官方文献为依据》), 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Berlin, 1873.

除了外交官之外,还包括随团的商务代表、牧师、船长、画家、自然科学家——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是带有“冯”(von)字头衔的贵族出身,艾林波的“楚”(zu)字头衔更高贵一些。这难免令人感慨,德意志的贵族为了“祖国(Vaterland)”——这个词他们念念不忘——的利益,不避艰难,千方百计而不辱使命,与我们的上层官僚们赔款割地,形成鲜明的对照。

外交特使团成员的亲历资料陆陆续续都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正式出版,这不仅表征出王朝体制下的德意志列国出版业的发达,更表征出其王朝政治的开放心态。同时期王朝体制下的中国赴外游历官员倒是必须在回国后提供一份出国考察报告,然而,这样的报告首先是官样文章,所以其中的官话、套话和废话居多。那个时代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非贵族外交官郭嵩焘及其所撰写的《使西纪程》,就因为动了真情,说了真话,结果丢了乌纱帽,名声扫地,灰头土脸,一直到老死乡里也不再被起用。同一种游记的不同命运所折射出的,不正是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舒展和大清国人的猜忌张皇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语文献里的中国游记,恰恰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和理解自身历史和现状的一面不走形的镜子。

艾林波的“破冰之旅”,引发了德意志人对东亚、对中国的极大兴趣。随后,外交官、学者(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一直到1911年大清朝垮台,这些人留下了两百余种独立成书的游记(其余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单篇报道和学术报告也是数量可观,这里还没有将外交部档案、城市商会的经济档案、大公司、大银行的经济档案以及德侨在华社群的德文报刊计算在内)。这些游记的作者,不乏大名鼎鼎、影响巨大的人物,单是看看下面的名单,就不难估计这些文献的价值:艾林波和他的《东亚1860—1862年:艾林波伯爵书信集》(*Ostasien 1860—1862, In Briefen des Grafen Fritz zu Eulenburg*),那个时代的国际大商人、发现特洛伊古遗址的著名业余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和他的《1865年:穿越中国和日本》(*Reise durch China und Japan im Jahre 1865*),

欧洲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和他的上、下两大本的《中国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uecher aus China*),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von Brandt, 1835—1915)和他的《三十三年在东亚:一个外交官的回忆》(*Dreiunddreissig Jahre in Ostasien, Erinnerung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那个时代少有的中国通、放弃德国外交官职位而进入李鸿章幕府做客卿的穆麟德和他的书信集《穆麟德的人生图景》(P. G. Moellendorff, *Ein Lebensbild*),奥匈帝国驻华公使、著名汉学家讷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 1862—1945)和他的《自传》(*Lebenserinnerungen*),巴兰德的后任海靖的夫人 Elisabeth von Heykin 和她的《来自四个世界的日记》(*Tagebuecher aus vier Weltteilen*),还有德国外交部派到中国的中文翻译、清朝驻德公使馆的德文翻译、德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汉学教授席位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5)和他的《两个世界的回忆》(*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新教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他的《中国的灵魂》(*Die Seele Chinas*),等等。

德意志人是欧洲人里的后知后觉者:早期的文化积累如此——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倡言解放的一代德国史学家们喜欢自我调侃,说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创造出克里特文明的时候,日耳曼人只会躺在橡树上面呼呼大睡;^①近代的海外殖民也是如此——所以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晚了二十余年来到中国,一直到世纪末,才如愿攫取了胶州作为殖民地。但平心而言,也许是热爱旅游的民族较少偏见,也许德意志人天生就有求真的个人素质,也许是没有前面“一鸦”和“二鸦”用血与火与满清结下的冤仇,来华的德意志人在观察和记录中国时,富有同情的理解,比较实事求是。哪怕是首届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考察报告,在评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时,仍然言辞谨慎,有一说一:

① 参见 Joachim Fernau, *Rosen für Apoll——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en* (《献给阿波罗的玫瑰——希腊人的历史》), pp. 6~7, Herbig, 1961.

一种文化,能够把人数如此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并使其达到如此高的受教育的程度,达到如此高的生活水准,这个文化一定是有其坚实基础的。更何况,在这种文化中,武力因素又如此之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文明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和凝聚了家庭和国家。然而,即使是一个不具偏见的人,也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文化已经没有了创新力。今天的中国人,作为个体,显得疲惫、安于现状而有失尊严。^①

这样的“判词”,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有说服力和震撼力。面对挟裹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列强,大清政府及其官员的反应确实迟钝和麻木,其中很大部分的迟钝和麻木并非出自无意,而是以迟钝和麻木的态度,努力保住官位和俸禄。不用说京城和内地的官员,单看看上海的长官在外交饭桌上的表现,就不难判断出那时最开明的官员的见识和水平:

先是一阵寒暄,薛焕不断重申,条约之事在北京进展神速。然后,我们把他引入到隔壁的房间,并按照欧洲方式请他进餐。这个胖胖的阁下吃得多了,每上来一道菜,他都要问,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做的。他还把全部的餐后甜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他常拿起桌上放置的一只大大的黄铜痰盂,往里面吐痰,同时还不停地抽着黄铜的烟斗。^②

这位皇帝派来的通商事务大臣、江苏巡抚薛胖子实际上是上海的最高长官,在正式的外交筵席上,见到好吃的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把黄铜痰盂罐架在餐桌上,显示的不仅仅是缺乏教养,恐怕正好折射出洋务官员的政治素养和对外见识:

① 参见本书第一篇:《1861: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上海》。

② 参见本书第五篇:《1862—1864:拉度维茨书信中的上海》。

政治上一定要正确,不被人抓住把柄,黄铜痰盂罐是政治正确的象征——我们不必事事按照洋鬼子的礼仪行事;而洋人的好东西呢,尽管往自己的腰包里装,餐后甜点太具有西方物质层面的象征——白鸣钟、玻璃器皿,私下里,哪个官员不是爱不释手?

相比之下,在华的德意志人在观察中国时,更愿意深入思考。而其中有些人在华住得时间长了,很自然地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关心起中国的前途命运。在国运转换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热情地拥抱着西方的一切,“中国通” Secker 则忧心忡忡:

这本书《申》所要展示的,是以热衷于改革的年轻中国人为标志的几乎达两年之久的断裂时期。这些改革家们毁灭了古老的中国文化价值,盲目地模仿西方所有的东西。^①

这是不是中国近代对激进主义最早的反思?在那样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容易极端化,要么极端保守,要么极端激进,两极相通,两者的实质,都是对自身缺乏信心,对别人缺乏了解。上海作为那时改革开放的口岸,华洋杂居,两种文化并陈,这就为别人观察和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田野”。

那时的上海,是大清帝国的大门,常常是“鬼子进村”的第一站。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德意志人,多是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中国最欧洲化的城市。他们感兴趣的人和物,常常是中国人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来阅读他们的记载,同样感到新奇和意外。本书所选的材料,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半个世纪里上海的变化,都在这些资料中显露无遗;而这些游记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又为展示变化中的上海,提供了多样性。如此多样性的历史文献,不仅可以为丰富和加深我们的城市史研究提供崭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为我们认识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提供了有迹可寻的

^① Fritz Secker, *Schen* (《申》), 前言, Max Noessler & Co. GmbH, Schanghai, 1932.

视角和路径。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游记的内容庞杂,视角和观点各异,既充斥着成见、偏见甚至污蔑,也不乏对中华民族及其子民的同情和敬佩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无论是厌恶还是喜欢,这些文字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成为“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游记是即时性的文字,故多保留作者彼时目击耳闻的场景现象和真情实感;当然,游记文字又难免浮光掠影,德语中便有“旅行者好撒谎”(Reisende lügen)的俗语,表达的就是对由短时段的走马观花而产生的万言长篇游记作品的极端不信任。但对于史学从业者而言,没有复杂矛盾的历史陈述,就很难有可能清理出历史的实相,或者说,从复杂矛盾的历史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史学著述才可能接近历史实相。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代中国经济飞腾、愈来愈多的国人游走天下的背景下,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日益趋热,不断有学者呼吁从域外中国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学术,以求创新和超越。没有新资料的挖掘,创新和超越就失去了基础。可喜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大有进展,如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更可喜的是,翻译的范围也突破了单一的英语,如中华书局正在陆续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笔者希望,这本小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着更多语种的资料被翻译过来。通过文献的翻译,研究方法的借鉴,东西学者的交流,或许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能够在一阵热闹之后,出现有价值的成果。

为了节省篇幅和主题集中,书中极个别无关宏旨的段落省略不译。书中插图,有些选自同一本游记,有些选自同时代的游记,还有个别选自网络,希望这些图片能给读者带来更真切的历史氛围。

还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外国人名的翻译,已有的译名,按约定俗成,继续沿用。此处根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清史稿》,以及作者本人已有的译名,如恩司诺和海司,个别译名根据《德汉字典》附录德国常见人名录加以誊抄,大多数不重要的人名未予翻译,以避免一名多译造成的

混乱。

最后,我们真心期待着方家的批评和指教。

辑译者

2008年12月于上海